

# 陶渊明作品与小说叙事之关系研究\*

朴雲錫\* · 钟书林\*\*\*

## 目 录

1. 绪论
2.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小说叙事风格
3. 陶渊明《孟府君传》与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叙事之比较
4. 陶渊明咏史诸篇与小说叙事的内在关系
5. 陶渊明《乞食》奇文与小说叙事及干谒风气
6. 结语

## 1. 绪论

美国学者浦安迪先生比较中西古代小说特征时指出：西方的小说原则上是虚构艺术，只与历史传说有些微弱的关联。而中国小说对于“虚构”与“实事”却从来没有过严格的分界线。西方文学理论家一般认为，历史讲实事（fact），小说讲虚构（fiction）。中国古代批评家则强调，“历史中有小说，小说中有历史”，“叙事”既包括小说也包括历史，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所谓“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或“三分实事七分虚构”，说的便是这个意思。从中国文化的叙事审美角度来看，“实”与“虚”并非简单地处于对立状态，二者常有互补的部分。<sup>1)</sup>浦先生上述论断精辟地分析中国古代小说区别于西方小说的独特之处，也成为我们本文探讨陶渊明作品与小说之关

\* 이 연구는 2014학년도 영남대학교 학술연구조성비에 의한 것임.

\*\* 岭南大学校 文科大学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教授

\*\*\* 中国 武汉大学 文学院 副教授 文学博士

1)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系的立论的出发点。

陶渊明具有很高的史学才华，是叙事著文的行家。萧统《陶渊明传》开篇称誉陶渊明显：“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陶渊明具有很高的史学才华，按《宋史》、《晋书》等记载，他曾被朝廷征辟为著作(佐)郎，可见当时官方对陶渊明叙事才干的认可。他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等，都具有较强的叙事与传记色彩。其诗歌《命子》一篇，叙述自己的家族历史，很有些《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的味道。虽然用的是诗歌的语言方式，却不减其叙事与传记的风格。不过，陶渊明笔下的这些叙事性传记性作品，在那个私家著史肆力炒作的时代风气里，透过现代人的眼光，它们和“小说”之间总会牵扯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 2.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小说叙事风格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笔下的一篇大奇文，其结构之巧，立意之深，语言之妙，人物之奇，篇幅之精，都会给读过它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全篇仅174字，却胜过一篇大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传乎？酣觴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在创作手法，它突破了传统史传的叙事模式。“所有传记的开头，基本上都是这样一套模式，即：‘××者，×××××。……’或‘××者，××人也。……’而以‘××者，××人也。’为常式。当然也有一些略有出入，但大体不差。在姓名、籍贯、官

职等之后，接着便记述家世出身、生平经历、性行功业（包括思想、著述）等等，末了是交代这个人物的结局，有的还及于他的子孙后代。”这样一个模式，自从《史记》创作出来并定格之后，“不止后世所有传记作品在体式上都遵仿这一模式，就是碑、状、传奇、小说写人，也多采用这种模式”<sup>2)</sup>。《五柳先生传》作品的小说叙事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端：

第一，《五柳先生传》虽然表象上似一篇传记，却仿效西晋阮籍《大人先生传》、刘伶《酒德颂》的寓言方式，采用小说家的笔法。<sup>3)</sup>鲁迅先生说：“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而无涉于传奇。”<sup>4)</sup>鲁迅认为《五柳先生传》等虽然还达不到唐代传奇小说的高度，却是晋代“幻设为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所以历来备受关注。鲁迅先生从“幻设为文”的角度，把《五柳先生传》与《桃花源记》并提，也可以见出鲁迅对《五柳先生传》类乎《桃花源记》小说性质的认可。黄仲仑先生称《五柳先生传》作品“自称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境界之高，想象力之大，远非晋人所能望其项背”<sup>5)</sup>，可见《五柳先生传》在“幻设为文”的晋代同类文学作品中臻至的高度。

第二，在传记人物上，它“用的既不是第一人称也不是第三人称，他是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来讲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sup>6)</sup>，这是小说惯用的手法。

第三，在叙事手法上，它“突破了史传文学通用的文学线索，代之以生活琐事的横向组合和概述，开篇对于传主的介绍也已经完全虚灵化、诗意化了”<sup>7)</sup>。

第四，在全篇的立意上，它完全幻设虚化了，以寓言寄托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情感。有学者试图闯入作者的幻设空间，打开他的心灵钥匙，其说法也颇令人耳目一新。他说：“（《五柳先生》）以戏笔抨击门阀制度。他借以‘自况’的五柳先生形

2) 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233页。

3) 一海知义说：“这个似真非真、爱装糊涂的‘传记’却充分地反映了陶渊明对小说的关心和对空想、虚构抱有极大的兴趣。”（《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中华书局，2008，50页）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4页。

5) 黄仲仑，《陶渊明作品研究》，帕米尔书店，1965，257页。

6) [日]一海知义著、彭佳红译《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中华书局，2008，20页。

7) 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齐鲁书社，2005，420页。

象，完全是针对门阀制度的崇尚塑造的。以‘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否定地望的显赫；以‘亦不详其姓字’否定门第的高贵；以‘环堵肃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否定资财的殷实；以‘不慕荣利’否定官爵的矜夸；以‘宅边有五柳树’否定世族门前旌表功绩的‘阊阖’。就是说，门阀制度的‘高贵’之有，五柳先生即陶公全然皆无。他以不知地望、不知姓氏、不知资财、不知荣利、不知阊阖，甚至不知自己是何朝何代之人（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全面否定门阀制度。名曰为五柳先生立传，然而，写传而‘一问六不知’，岂不是滑天下之稽！”<sup>8)</sup>倘若照此理解，寓意真是深极了！

不过，这样一篇深含寓意的文章，在当时人的眼中，却被称为“自况”、“自序”、“实录”。《宋书·隐逸传》记载：“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陶渊明传》（以下简称“萧《传》”）云：“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现代学者更将它视作“自传”。汉、晋时期文学家的“自序”，透过后世或现代人的视角，也是颇具小说家色彩的。

第五，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自传的虚构性质，还可以通过隋唐诗人王绩、白居易的自传体创作窥见一斑。王绩、白居易，作为陶渊明的追随者，终生服膺。

王绩仰慕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幽居，归隐东皋，自号东皋子。又仿自号“五柳先生”的陶渊明，而自号“五斗先生”。《唐才子传》说：“（王绩）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其《五斗先生传》自叙云：“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遂行其志，不知所如。”其“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与《五柳先生传》“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如出一辙；其“忽焉而去，倏然而来”，与《莲社高贤传》描述陶渊明“许饮则往，忽攢眉而去”，情形颇类；其“故万物不能萦

8) 魏正申，《陶渊明探稿》，天津出版社，1990，76页。

心焉。……遂行其志，不知所如”，与《五柳先生传》“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境界无异。

白居易更是仰慕陶公的大家，《五柳先生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更非一般。他自叙说：“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访陶公旧宅》）俨然以五百年后的陶渊明白居，他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成为大量效和陶诗的第一人。白居易深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常著文章自娱”的影响，晚年自号醉吟先生。《唐语林·栖逸》记载：“白居易少傅分司东都，以诗酒自娱，著《醉吟先生传》以自叙。”《唐才子传》也载：“（白居易）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传中“晏如”之语，即出自《五柳先生传》。可见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系仿照陶公《五柳先生传》，皆为自叙之作。陶公《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也被时人目为自叙“实录”。《唐语林·企羡》记载：“白居易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相传洛阳士人及四方游人过曷墓者，必奠以卮酒。”又《唐语林·赏誉》载：“大中末，谏官献疏，请赐白居易谥。上曰：‘何不读《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赐谥。”时人镌刻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于其墓侧，皆过曷敬仰，足见时人对白氏自传的认可。连当时的宣宗皇帝读了《醉吟先生传》，也觉得再赐谥号，显得多余。

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一开篇就说：“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俨然又一幅《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传》开篇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白氏自叙这样开头，刻意模仿之迹赫然。

唐代刘知几《史通·序传》说：“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sup>9)</sup>《史通·杂说》又说：“马卿（我们按：指司马相如）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彙斯篇，即为列传。”可见同时代人司马迁将司马相如的《自叙传》也视为实录，并编入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然而，在后世及现代学者看来，司马相如《自叙传》作为“实录”，载入正史，不免有些不称。刘知几《史通·序传》说：“相如

9)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卷九, 256页。

《自叙》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言外之意，司马相如《自叙传》小说家的味道过浓，司马迁载之于《司马相如列传》中，很不适宜。现代学者钱钟书先生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王孙事酷肖《儒林外史》中胡屠户之于‘贤婿老爷’；此当出马迁渲染之笔，不类相如《自叙》语气也。”<sup>10)</sup>由于《自叙传》的小说色彩过浓，钱先生反而怀疑不是司马相如的原笔，而是司马迁的“渲染之笔”。

其实，汉、晋文学家的自叙多半夸饰如此。《汉书·扬雄传》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下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雄之自序云尔。”<sup>11)</sup>该传也是班固根据扬雄“自序”实录而成。其文字对于《五柳先生传》影响真还不小。

扬雄《自叙传》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	闲静少言。
为人简易佚荡。	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自有下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博览无所不见。	博学（萧统《陶渊明传》）
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不慕荣利。
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顾尝好辞赋。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酣觞赋诗，以乐其志。

10)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第一册，357—358页。

11) （汉）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卷八七，3514、3583页。

两相比照，《汉书·扬雄传》所载的扬雄自叙，基本上都可以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可见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对扬雄“自序”的承袭。

又以汉代文学家东方朔为例。《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汉书》称东方朔自叙“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可见其浮夸之气。《东方朔传》传末，《汉书》论赞说：

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杨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及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象焉。<sup>12)</sup>

《汉书》评论东方朔“喜为庸人诵说”，“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称他为“滑稽之雄”，最后又说“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一再强调东方朔与滑稽小说之间的关系。其作为具有“实录”性质的传记，也多采自东方朔的自叙。刘知几《史通·杂说》说：“《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繁碎，不类诸篇。且不述其亡歿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相类。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而自东方朔、扬雄以下，自叙更加浮饰夸诞。刘知几《史通·序传》说：“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至魏文帝、傅玄、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而依上文所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与扬雄自叙关系亦十分密切。由此可见“时人”以及正史、萧《传》所称的“自况”、“自序”、“实录”的本

12) 同上，卷六五，2874页。

质。透过唐代刘知几，尤其是现代人的眼光，这些汉、晋人所作的“实录”与“自序”或“自况”，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小说叙事特征。

正因为上述原因，石昌渝先生曾经指出，“实录”性质，实际上是唐代以前的“古小说”（石先生将两汉魏晋南北朝小说称之为“古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则之一。他说：“实录和宗教目的是决定志怪小说性质的两大原则，与这两大原则对立的是虚构和娱乐目的，这一对矛盾中，虚构和娱乐的目的否定志怪小说的矛盾方面。”<sup>13)</sup>不仅如此，石先生还指出，实录和短小，正是作为“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的古小说的特征。他分析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残丛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存之。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他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sup>14)</sup>其主要原因在于，“古小说在文体上独立了，但在精神上并没有独立，它始终依傍着史传，扮演着史传的附庸的角色。”“从古小说的叙述方式看，受史传影响也是明显的”。<sup>15)</sup>依照石昌渝先生的论述，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兼具“古小说”实录和短小的两大特征，典型体现了《五柳先生传》作为“自序”、“实录”与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顾随先生曾说：“读小说令人如见，便因其写的是真实。”<sup>16)</sup>似乎指的也是上述情形。不过这正是汉、晋自叙传记作品的本色与时代烙印，是当时私家著史作传的必然。

13) 石昌渝，《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80页。

14) 同上，2页。

15) 同上，54页、55页。

16) 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顾随诗词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2页。

### 3. 陶渊明《孟府君传》与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叙事之比较

《孟府君传》即《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以下简称《孟府君传》），是陶渊明的又一篇大文章。全文长达一千多字，是陶渊明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也是他唯一一篇超过千字的长文。<sup>17)</sup>作品作于元兴元年陶渊明遭母丧之后，诸家系年分歧不大。按陶渊明享年63岁计，时年38岁，丁忧在家。《孟府君传》按照一般传记叙事模式，开篇云：“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鄆人也。”往下依次略叙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事迹，然后详叙孟嘉一生行迹、功业和思想。传末交代作传缘由和背景：“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寔钟厥心。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并作有传赞，评论孟嘉的道德功业，最后以“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归结全传，对外祖父的英年早逝黯然伤悼。但是，在具体的叙事风格上，《孟府君传》与一般的正统史传作品，又表现出较大的不同。正如李剑锋先生所说：“《孟府君传》没有像正统史传一样注重写传主的功业，却格外注重写传主的脱俗的逸闻趣事。全传记述了孟嘉对庾亮问、被褚裒认出、龙山落帽、与许询交往、答桓温问等一系列小事，与军国大业几不相关。”<sup>18)</sup>在选材谋篇与结构立意上，体现出较为鲜明的小说家叙事风格。正因为此，《孟府君传》中描叙的孟嘉被太傅褚裒认出事，被载入稍后刘义庆编撰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识鉴》16云：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曰：“卿自求之。”褚呵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此段文字，大体取自陶渊明的《孟府君传》，而只是略加裁剪、加工：

太尉颍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

17) 陶集中富有争议的作品《五孝传》、《圣贤群辅象》不算入内。即使这些作品为陶渊明所作，也只是他平日的读书笺记，算不得著述。详细参见杨勇《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14页、324页）

18) 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齐鲁书社，2005，416页。

事。……太傅河南褚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

两则故事中，褚裒与庾亮的精彩对话，我们用着重号标出，其内容大意与感情色彩大体相同。其实，陶渊明《孟府君传》中颇具“志人体”色彩的描叙，远不止这一处。因此，梁朝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此则故事时，又将其中不见载的一些精彩片段：孟嘉对庾亮问、龙山落帽、答桓温问等，作了补充。

太尉庾亮领江州，辟嘉部庐陵从事。下都还，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待还，当问从事吏。”亮举麈尾掩口而笑，谓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

后为征西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僚毕集。时佐史<sup>19)</sup>并著戎服，风吹嘉帽堕落，温劝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嘉初不觉，良久如厕，命取还之。

命孙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还即答，四坐嗟叹。

嘉喜酣饮，愈多不乱。温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嘉答曰：“渐近自然。”一坐咨嗟。转从事中郎，迁长史。年五十三而卒。<sup>20)</sup>

上述刘孝标注引文字，我们用着重号标出的精彩内容，与陶渊明《孟府君传》，几乎一致。仅有孟嘉答孙盛嘲文的文采评价，陶渊明《孟府君传》有“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八字，作为陶渊明对于外祖父的溢美之词，被刘孝标注引时删去了。<sup>21)</sup>其余大体皆从陶渊明《孟府君传》而来。

此外，陶渊明《孟府君传》中，刘孝标注引未录的，还有两则主要文字：

19) 史，陶渊明《孟府君传》作“吏”，《晋书》同。

20)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99页。孟嘉“年五十三”卒《晋书·孟府君传》。陶渊明《孟府君传》作“年五十一”，可信从。作“五十三”，“三”或为“一”字传抄之讹。

21) 此八字，《晋书·孟府君传》作“其文甚美”。

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隼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隤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

前一则是孟嘉被名士许询认出，与被褚裒认出事，大体近同。疑孟嘉被名士认出事，或有两种版本，陶渊明作传时，一一诉诸笔端。后一则通过桓温、孟嘉同僚刘耽之口道出：孟嘉堪有三公之才。这两则文字未被刘义庆或刘孝标选入，各有原因。前一则孟嘉被名士许询认出事，与被太傅褚裒认出事雷同近似，刘义庆、刘孝标仅择取了被太傅褚裒认出事。后一则称誉孟嘉为三公之才，不免溢美。与前文所论溢美孟嘉之文“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原因一样，不为刘义庆或刘孝标所重视。

总体而言，陶渊明《孟府君传》的主体内容，都被刘义庆《世说新语》或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所引。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的文字，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编入唐代官修的《晋书》中。唐修《晋书》中，《孟嘉传》作为《桓温传》的附传，附于其后。唐修《晋书》好采小说家言，已是共识。如清代四库全书的编修者纪昀等指出《晋书》“忽正典取小说，……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sup>22)</sup>正史《晋书》好小说家言，再次体现了中国古代史传作品与小说叙事的密切关系。陶渊明《孟府君传》，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时，称“嘉别传”，即《孟嘉别传》。可见陶渊明的《孟府君传》在后世传播中，虽然被视为“别传”，但透过后世及现代的眼光看，同样具有小说的色彩。

陶渊明在《孟府君传》传末交代作传的背景时说：“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

22) (清)纪昀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4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25页。

按采，一作“按拾”。采，指采访。拾，即拾取，还有拾遗之意。《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谈到《史记》的创作时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陶渊明确说“按采（拾）行事，撰为此传”，意谓通过采访、拾遗外祖父的往事轶闻，写成这篇传记。据《晋书·干宝传》所载，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虽然干宝信誓旦旦，表示《搜神记》“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绝对“为信者”，但后世仍将《搜神记》视为小说家言，归入志怪之类。陶渊明为作《孟府君传》，“按采行事”，网罗天下往事轶闻，结果亦被大量地收入《世说新语》及其注引中，不免被归入志人小说的行列。这也是晋、宋时风使然，后世对待古代小说的视角使然。

#### 4. 陶渊明咏史诸篇与小说叙事的内在关系

陶渊明作品中的《咏三良》、《咏荆轲》等，均是经典的咏史篇章。先说《咏三良》。三良，指秦国大夫子车氏的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三良故事，自先秦，经两汉，到两晋，流传甚广。至陶渊明时，已是流传甚久，其间不断地增饰、虚构。尤以三良的死因，由被杀，到自杀，说法出入较大。杨伯峻先生说：“先秦皆谓三良被杀。自杀之说，或起于汉人。”<sup>23)</sup>赵翼考证说：“三良之殉，《左传》及《诗序》皆云穆公以子车氏三子为殉，《史记·蒙毅传》亦云：昔穆公杀三良而死，故谥曰缪。然《汉书·匡衡传》云：秦穆贵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则是出于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矣。”<sup>24)</sup>到三国时期，王粲、曹植、阮瑀等

2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六年”，中华书局，1981，547页。

24) (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卷二“汉儒说《诗》”，30页。

人笔下，均有咏三良诗，并赋予忠义的色彩。

其实，三良故事，从先秦时期起，就已呈现出虚构化的发展趋势。清人顾炎武曾列举“三良殉死”例，来阐明《左传》记载不可尽信：“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sup>25)</sup>王粲咏三良诗开篇即说：“自古无殉死，达人共所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为秦穆公翻案，根本否认历史上有“殉死”之事，说穆公杀三良纯属虚构。<sup>26)</sup>

而《咏荆轲》中的荆轲事迹，在民间流传已久，更具小说家的性质。战国以降，《史记·刺客列传》及被后世誉为“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等典籍中，荆轲故事被不断加以虚构。《燕丹子》大约成书于秦汉间，其记载荆轲之事，不同于《史记》，也不尽同于东汉王充《论衡》诸篇所引的“传书”，可见它来自民间的渠道不同。它的传闻虚造之事，被视为“鄙诞不可信”。以其故事情节虚构的典型性，因而被胡应麟称为“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王充《论衡》曾经多次提及荆轲故事的虚妄，并作有辨证。

传书言：荆轲为燕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此言精感天，天为变动也。夫言白虹贯日，太白蚀昴，实也。言荆轲之谋，卫先生之画，感动皇天，故白虹贯日，太白蚀昴者，虚也。（《论衡》卷5《感虚》）

传书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不得，诛死。后高渐丽复以击筑见秦王，秦王说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击筑。渐丽乃置铅于筑中以为重，当击筑，秦王膝进，不能自禁。渐丽以筑击秦王颞，秦王病伤，三月而死。夫言高渐丽以筑击秦王，实也；言中秦王病伤三月而死，虚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论衡》卷4《书虚》）

传语曰：“叮叮若荆轲之闻。”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恚恨不已，夷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故曰叮叮。此言增之也。（《论衡》卷7《语增》）

儒书言：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剑，刺之不得。秦王拔剑击之。轲以匕首掷秦王不中，中铜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轲势盛，投锐利之刃，陷

25)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岳麓书社，1994，卷四“左氏不必尽信”，155页。

26) 参考李文初《陶渊明论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94页。

坚强之柱，称荆轲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铜柱，实也；言其入尺，增之也。（《论衡》卷8《儒增》）

王充论及荆轲等故事记载说：“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沉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譎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sup>27)</sup>可见秦汉以降，燕太子丹、荆轲故事在民间传播的盛况。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解释这一原因时说：“原其所以有兹语者，丹实好士，无所爱吝也，故闾阎小论饬成之耳。”<sup>28)</sup>三国阮瑀有《咏史诗》二首，其一首咏三良，第二首咏荆轲。由此亦可见陶渊明《咏三良》、《咏荆轲》诗歌，与秦汉、三国时期民间流传、诗坛歌咏三良、荆轲世风的密切关系。综上所述，王粲说穆公杀三良纯属虚构，而燕太子丹、荆轲事自《燕丹子》后，更是出于民间街谈巷语。陶渊明根据这些“街谈巷语”，翻出了新意，表达内心的感伤、忠愤；可算对小说、咏史题材的翻新。<sup>29)</sup>

## 5. 陶渊明《乞食》奇文与小说叙事及干谒风气

《乞食》诗，是陶渊明笔下的又一篇大奇文。诗云：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

27) (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卷四《书虚》167页。

28) (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1，卷二“封泰山禅梁父”，68页。

29) 《燕丹子》叙述燕太子如何招纳荆轲去刺秦王，仅写到荆轲刺秦王未遂而止。陶渊明《咏荆轲》开篇即云：“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结尾云：“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也是叙述燕太子如何招纳荆轲去刺秦王，仅写到荆轲刺秦王未遂而止。二者结构、剪裁极为相似。

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一作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单论它的主旨，古今学人，分歧较大。有人认为是“惭笔”，是“屡乞而多惭”而作<sup>30</sup>；有人认为“欲得一食”，“大类丐者口颊”<sup>31</sup>；有人认为“非真丐者人食”，而有游戏之意<sup>32</sup>；有人认为“寄慨遥深”，有“故国旧君”之思<sup>33</sup>；有人认为与佛教“乞士”相似，乃“东晋佛门‘自然报应论’精神”体现<sup>34</sup>；有人认为是“一幅真实无比的乞食者的自画像”<sup>35</sup>；……说法众多，不尽相同。更有学者将《乞食》与《有会而作》等相比较，说陶渊明“为苟延生活而开始向官场朋友恳请生活物质方面的救助”，“由此可见他是个赖他人而生存的人”，“或者说是赖权力生存的人”，“又可见出是个趋炎附势的人”<sup>36</sup>。像如此立论，恐怕不免有刻意厚诬古贤之嫌。《乞食》诗到底因何

- 30) 唐代王维谓陶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而弃官，“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口其后之畏也。”（《全唐文》卷三二五《与魏居士书》）南宋韩子苍说：“余观此士既以违己交病，又愧役于口腹，竟不欲仕久矣，及因妹丧即去，盖其友爱如此。世人但以不屈于州县吏为高，故以因督邮而去。此士识时委命，其意固有在矣，岂一督邮能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犹不耻，而耻屈于督邮，必不然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注引）清代袁守定说：“《止酒》、《责子》、《乞食》诸作，为陶公惭笔。”（《占毕丛读》卷五）均持此类看法。
- 31) 宋代苏轼《东坡题跋》卷二《书渊明乞食诗后》云：“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生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04页）
- 32) 清代张玉谷云：“此向人借贷、感人馈赠留饮之作。题云《乞食》，盖乞借于人以为食计，非真丐人食也。观诗中解意遗赠可见。解者误会，唐突多矣。”（《古诗赏析》卷一三）
- 33) 清代陶必铨说：“此诗寄慨遥深，著眼在‘愧非韩才’一语。借漂母以起兴，故题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门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报，精卫填海之意见矣。此诗与《述酒》读书诸篇，皆故国旧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即安贫守道亦非诗中本义。至东坡之哀冥报，谓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亦借以自发牢骚耳，岂真以乞丐类公哉！痴人前不可说梦，良然。”（《莫江诗话》）
- 34) 丁永忠，《陶诗佛音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91-92页。
- 35) 龚斌，《陶渊明与佛教关系之再讨论》，《第三届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江学院学报》2008年专辑，20页。
- 36) [日]冈村繁著，陆晓光、笠征译《陶渊明李白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0-101页。

创作？陶渊明为何乞食？我们也想结合前贤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理解思路。

### 1) 《乞食》与食禄

《乞食》诗作于陶渊明早年。魏正申先生说：“陶渊明为实现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有渴望举荐而尽早入仕，施展才干的思想，《乞食》诗便是较为有力的佐证。……‘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里引用韩信入仕而施才、有成而报恩的典故，明确地表述了陶渊明希望自己像韩信那样，辅佐明君而成就大事业，也要像韩信那样，报漂母之恩的思想实际。陶渊明深知，‘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理想的实现，要靠进入仕途社会。因此，开始‘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请人举荐入仕，以实现入仕有为理想。《乞食》诗采用借托的手法，选取颇能借以抒情的事例而设事，……以托言行乞得赠，表达企望举荐的从政之想。”<sup>37)</sup>魏先生对《乞食》诗的解析，新颖而独到，可惜或囿于体例和篇幅，未能展开。今在魏先生的基础上，我们略加深入阐发，以坚此说。

第一，在古代词义中，“食”有做官或俸禄的意思，陶渊明诗题曰“乞食”，不能排除具有这一方面的意思。《周礼·天官·医师》：“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郑玄注：“食，禄也。”《诗经·大雅·桑柔》：“好是稼穡，力民代食。”郑玄笺：“令代贤者，处位食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失官不食。”杜预注：“不食禄。”《墨子·天志下》：“何以知兼爱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孙诒让《墨子间诂》：“食，谓享食其赋税物产。”以上“食”字，皆具有“俸禄”或“享受俸禄”的意思。因此，陶渊明诗题曰“乞食”，解释为“乞求俸禄”或“乞求享受俸禄”，意思也通。其诗题曰“乞食”，即有乞求为官，希冀举荐从政之义。诗中所表达的迫切建功立业，“大济于苍生”的理想，正是其早年政治心态的体现。“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其八）“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其四）“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均表现他早年的政治豪气与理想追求。

37) 魏正申，《陶渊明评传》，天津出版社，1996，170—171页。

第二，陶渊明因贫而仕，被迫仕宦求食。这在诗文中，多有体现：

- (1)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其十）
- (2)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饮酒》其十九）
- (3)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归去来兮辞》）
- (4) 穷苦荼毒（一作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
- (5) 余尝学仕，缠绵人事。（《祭从弟敬远文》）

为饥饿驱使，为解决一家老小的生计，陶渊明不得不“缠绵人事”，尝试仕途求食之路，先后五次仕宦为官。《宋书·隐逸传》记载：“（潜）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陶渊明因为“亲老家贫”而作“州祭酒”；后辞州主簿，却“遂抱羸疾”，不得以再次出为镇军、建威参军；为求“三径之资”，出仕为彭泽令。结合《宋书》本传记载、陶渊明诗文作品，陶渊明被迫出仕为官，为解除贫饥而“东西游走”，确实是他早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一旦辞官，生活便不免陷入酷贫境地。《咏贫士》其七：“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诗歌虽然“咏黄子廉，亦以自况也。仁妻所劝之言，似亦切合渊明实际”。陶渊明甚至在《杂诗》（其八）中伤感地写道：“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sup>38)</sup>仕宦与食禄，原本就不是自己所奢望追求的。别人皆有适当的方法以谋生，而自己谋生却无方。拙于谋生，为谋求“生生之资”，他才不得以“求之靡途”，求取食禄。同时，他一再表示：“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饮酒》其十）对于食禄营生，他要求的并不高。但即使这样，他也觉得大为违背自己的性情：“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深愧

38)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379页。

平生之志”，不得以辞官归隐，彻底告别这样的“求食”生活，不再为五斗米而折腰。

第三，当时国家给的俸禄，也是公田，曾经作为陶渊明求食之本。汉代以来，凡封王侯者，都有一块作为俸禄的食邑，称为“食封”。汉代贾谊《新书·大政》有“官驾百乘而食食千人”的说法。到晋代时，也有官员享受俸禄的相关规定。《晋书·职官志》记载：

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元康元年，给菜田十顷，田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  
 特进品秩第二，位次诸公，在开府骠骑上，冠进贤两梁，黑介幘，五时朝服，佩水苍玉，无章绶，食奉日四斛。……元康元年，给菜田八顷，田驺八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  
 光禄大夫与卿同秩中二千石，著进贤两梁冠，黑介幘，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奉日三斛。……惠帝元康元年，始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门亭长、门下书佐各一人。  
 尚书令，秩千石，假铜印墨绶，冠进贤两梁冠，纳言幘，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奉月五十斛。……元康元年，始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  
 ……

尚书令以下，《晋书·职官志》不载各职官“食奉月”和“给菜田”的具体情况。但依此类推，可以约略知道往下职官的大致情形。据《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出任彭泽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秫，妻子固请种秬，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可知在当时，朝廷给县令的菜田应是三顷，比尚书令少一倍。又，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任彭泽令后，“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当时朝廷给县令的“田驺”应是三人。比照上引《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品秩第一，“给菜田十顷，田驺十人”；特进品秩第二“给菜田八顷，田驺八人”；光禄大夫“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尚书令“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朝廷赐给菜田“顷”数与“田驺”数相同。虽然史书对于尚书令以下没有详细记载，但依此类推，在当时，县令应该“给菜田三顷，田驺三人”。陶渊明从“田驺三人”中，遣送一人给其子，帮助他们

砍柴打水。田畴，是指专事农业的役隶。所以萧统《陶渊明传》说是“送一力给其子”。

又，《宋书·隐逸传·陶潜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对于“五斗米”的理解，向来分歧较大。有人认为是五斗米教；有人认为是每月的饭量。<sup>39)</sup>其实，参照上引《晋书·职官志》记载，诸公及开府，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特进品秩第二“食奉日四斛”；光禄大夫“食奉日三斛”；尚书令“食奉月五十斛”。五斗米，应该是陶渊明作为县令每日的“食奉”。五斗米，为当时县令每日享受的俸禄级别。每日五斗米，即每月十五斛。比照尚书令的“食奉月五十斛”，这样的理解，应该大致不差。

综上，根据《晋书·职官志》、《宋书》等陶渊明本传可知，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当时的县令俸禄是：“食奉月十五斛”，“给菜田三顷，田畴三人”。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实际上是说我不能为了每日的那点食奉，而向乡里小人折腰。从这个意义上讲，陶渊明的辞官，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实际也是为食禄。

第四，陶渊明从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萌生了不为食禄而委屈的悔意。《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归去来兮辞》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在这里，他对五次出仕的人生经历作了总结，“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深刻表达他而“口腹”而出仕的内心悔悟。在他之后的诗文中，也一再地回忆这段人生经历，表达“觉今是而昨非”的醒悟。

39) “五斗米”，逯钦立先生认为指五斗米道教(《读陶管见》)，缪钺先生认为是每月的饭量(《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解》)。

《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与子俨等疏》：“穷苦荼毒（一作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祭从弟敬远文》：“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我们所加着重号之句，均表现出陶渊明为食禄出仕的悔意。

第五，《宋书·隐逸传》记载：“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夏肯仕。”《宋书》对陶渊明早年的“薄宦”，有“不洁去就”之讥。这似乎与他早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为贫而仕，被迫仕宦求食的人生经历有关。

## 2) 《乞食》与魏晋干谒风气

在魏晋九品中正制盛行的年代，没有人荐举，几乎很难出去做官。陶渊明曾祖陶侃曾欲“仕郡”，而“困于无津”，得鄱阳孝廉范逵举荐，方才渐入仕途。陶渊明先后出仕五次。二十九岁初仕，出为江州祭酒。杨勇先生说：“魏晋之际，高门之家大多早仕；渊明祖代世簪，而二十九岁始仕，可谓‘迟迟出林’者矣。”<sup>40)</sup>与陶渊明同时代的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陶渊明“初辞州府三命”。可知在此之前，朝廷也曾有过征辟。州祭酒，职位较高。逯钦立先生说：“按《宋书·职官志》，江州自晋成帝咸康中始置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此别加祭酒，至刘宋初始撤除。知陶为祭酒，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sup>41)</sup>陶渊明初仕，职位就已经较高，必与人举荐有关。时江州刺史为王凝之，为王羲之之子。陶渊明初仕选择王凝之，可能与陶、王两家祖辈的渊源密不可分。按《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受王敦的知遇之恩甚隆。王敦，即王羲之的堂伯父。陶侃为武昌太守，王敦“表拜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

40) 杨勇，《陶渊明年谱汇订》，《陶渊明集校笺》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15页。

41) 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陶渊明集》附录，中华书局，1979，265页。

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后陶侃因军事失利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领职”，不久又“奏复侃官”。王敦举兵造反，“诏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寻转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复本职，加散骑常侍”。可见陶侃未贵赫时，受王敦的恩遇。陶渊明“初辞州府三命”，而初仕选择江州刺史王凝之，或与此相关。

萧统《陶渊明传》云：“（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陶渊明辞州祭酒、州主簿后，时隔四年，又仕于桓玄幕下。<sup>42)</sup>陶渊明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专叙行役事。不少论者怀疑陶渊明此行是为桓玄所迫。叶梦得谓“渊明之行在五年，疑其尝玄迫仕”，朱自清、逯钦立、杨勇等诸位先生，均从此说。<sup>43)</sup>陶渊明出仕或迫仕桓玄，盖因其外祖父孟嘉与桓玄之父桓温的密切关系，事详见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晋书·桓温传》附《孟嘉传》。之后，陶渊明又出仕镇军将军、建威将军参军，至于其中原因，是否有人举荐，史载不详。

不过，最后一次出仕，陶渊明为彭泽令，是求过诸侯，并且由家叔出面帮忙的。《归去来兮辞》序中说得很清楚：“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序中交代，他出任彭泽令，一是亲戚故旧的多次劝说，二是诸侯惠爱仁德的关照，三是家叔的举荐和说情。可以想见，陶渊明在亲戚故旧、家叔的热情劝说与帮助下，去干谒诸侯，求取彭泽令的情形。而使陶渊明动心的是：“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序中交代也很清楚。

综上，《乞食》诗似为一首干谒诗，表达陶渊明希冀得到举荐的从政理想。透过《归去来兮辞》，我们了解到，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也是通过家叔举荐、干谒诸侯才成功的。在此之前的几次出仕，其干谒情形也大致可以想见。

不过，由于受到性格因素的影响，在《乞食》诗中，陶渊明不愿意将干谒的意图说得很清。“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袁行霈先生说：“此行原非有意于乞

42) 陶渊明仕桓玄，诸家系年稍有差异，兹从杨勇先生说。请参阅杨勇《陶渊明年谱汇订》，《陶渊明集校笺》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18页。

43) 同上，419页。

讨也。而一乞食竟至以‘冥报’相许，足见非一饭之可感，要在主人之仁心厚意感人肺腑。‘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字字出自心田，惭愧之情溢于言表，绝非丐者顺口谢语。关于诗中‘主人’，亦有可论者。此人无须渊明出言而已知来意，非但‘遗赠’，且又‘谈谐终日’，‘倾杯’‘赋诗’，何等体贴！何等高雅！”<sup>44)</sup>袁先生所论，也强调“原非有意于乞讨”、“非一饭之可感”。如果仅是一顿饭食的施舍，陶渊明便说出“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样重谢的话语来。那么平日经常置酒招待他的“亲旧”<sup>45)</sup>，给他二万钱的颜延之<sup>46)</sup>，还真不知陶渊明又该是怎样的感谢！而事实上，在诗文中，对于颜延之，以及那些“亲旧”的名字，陶渊明只字未提。

另一方面，正如袁先生所强调的，诗中“主人”为高雅、体贴之士，非一般等闲之辈。因此，诗中“主人”，我们疑其为陶渊明所在乡里中正。<sup>47)</sup>魏晋时期，中正的主要职责就是区别人物，评定九品，并以此作为吏部铨选授官的重要依据。自曹魏以降，中正根据乡论清议厘定、提升或贬降士人，乡品对士人的官职升迁和仕途进退产生重要影响。<sup>48)</sup>诗中的“主人”为中正，主乡论清议、官职铨选，陶渊明即使“叩门拙言辞”，“主人”也会了解他的来意。所以说“主人解余意”。又接着说“遗赠岂虚来”，意谓主人有所馈赠，而不虚此行。<sup>49)</sup>可见应是陶渊明求仕成功，所以才会“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说出这样激动的话，表示希望自己像韩信那样，辅佐明君而成就大业，也要像韩信那样，重重地报答漂母知遇之恩。即使做不到像韩信那样的成功，也会心中戡藏感谢之意，待死后相报。如果这样理解，全诗的文意似乎就顺了许多。

44)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106页。

45)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被时人称为“自况”、“实象”。

46) 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先是颜延之为刘抑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等记载同。

47) 日本学者沼口胜考证《乞食》诗中的主人为江州刺史刘柳，可供参考（《关于陶渊明〈乞食〉诗的寓意》《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增刊，30—36页）。

48) 参考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15—16页。

49) 参考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104页。

陶渊明多次被朝廷征聘为官。颜延之说他“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对于陶渊明人生中的五次出任，仅叙及彭泽令一次，并将它和“辞州府三命”并提，可见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疑均与州郡中正举荐有一定关系。《宋书·隐逸传》说陶渊明辞州祭酒后，“州召主簿，不就”，又说“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萧统《陶渊明传》也说：“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馈以粱肉。”所有这些，大致都与中正的举荐有着极大、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乞食》诗的创作，以及诗中“主人”的身份。

如陶渊明《乞食》诗，通过干谒，希冀得到援引，或求得食禄，或谋取声誉，这在魏晋以降的九品中正制时代，是一种普遍风气。陶渊明《乞食》诗的出现，即是这一世风的反映。单以文学领域的干谒为例，即可窥见当时世风之一斑。《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面急走。<sup>50)</sup>

钟会为钟繇之子，为当世望族，其欲为《四本论》延誉，尚且如此，其余士人更可见一斑。其如陶渊明、钟会等干谒希冀延誉者，有不幸者，亦有幸运者。不幸者如钟嵘，史称他“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本州秀才”（《梁书·文学传上》）。其所撰《诗品》成，希冀求誉于沈约，而沈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南史·钟嵘传》），所著《诗品》不得以列沈约的诗为中品，以泄其私愤。幸运者如刘勰，史称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文学传下》）。比起钟嵘，刘勰可谓幸运儿，干谒成功，《文心雕龙》亦为时所重。不过，他为了引起沈约的兴趣和关注，竟也算费尽了心思。其“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比起陶渊明的“乞食”自嘲来，同样卑微而酸辛。这在魏晋以降九品中正制盛行的世风中，庶族

50)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95页。

寒人倘若要想干谒，恐怕都不免于此。

### 3) 《乞食》与小说及干谒

小说与干谒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马永卿注：“庄子与梁惠王同时，是时已有县令，见《史记·六国年表》。”马叙伦先生注：“县，读为‘郡县’之‘县’。《史记·赵世家》：‘以万户都之封太守，千户都封县令。’是战国时县小于郡，县长称令矣。”庄子在这里讲到：那些文饰鄙俚的言词而干求县令的人，要想飞黄腾达，也就距离事实遥远了。<sup>51)</sup>这是“小说”一词的最早出处。可见，“小说”自从出现伊始，就被视为干谒的手段与工具。这一功能，在后世仍然保留，并推动着小说自身的发展。

魏晋以降，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干谒品评之风日盛，也促进了魏晋以来志人小说的发展。不少学者已经指出魏晋志人小说的繁盛与当时干谒、品评风气的密切关系。鲁迅先生说：“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象当时乡间学者想要成名，他们必须去找名士，这在晋朝，就得去拜访王导、谢安一流人物，正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但要和这流名士谈话，必须要能够合他们的脾胃，而要合他们的脾胃，则非看《世说》、《语林》这一类的书不可。例如：当时阮宣子见太尉王夷甫，夷甫问老庄之异同，宣子回答说：‘将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给他官做，即世所谓‘三语掾’。但‘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要学这一种缥缈之谈，就非看《世说》不可。”<sup>52)</sup>石昌渝先生也说：“魏晋以后，志人小说的勃兴，除了文体本身的原因外，客观上与选拔官吏的制度和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品评时人的风气有直接关系。”<sup>53)</sup>九品中正制的铨选方式，使得许多人“必须去找名士”，“去拜访王导、谢安一流人物”，品评、干谒

51) 参考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24页。

5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79页。

53) 石昌渝，《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55页。

之风播炽，使先秦时“饰小说以干县令”的小说干谒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众所熟知，六朝以降，唐代用传奇小说行卷干谒的科举之风，直接刺激了唐人的“有意为小说”，推动了唐代传奇的繁荣。宋人赵彦卫描述唐代的这一情形云：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贄，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sup>54)</sup>

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唐代进士用传奇小说来行卷的事实。对唐代行卷与文学深有研究的程千帆先生指出，唐代的科举行卷制度是由魏、晋九品中正制嬗变而来，受到九品中正制遗留下来的影响。科举士子“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这也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到了唐代，文士们更利用了这种办法来为争取进士登第服务。”谈及“原是古已有之”时，程先生即列举了上文所提到的钟会欲请嵇康看《四本论》，并希冀延誉的例子。<sup>55)</sup>程先生并说：“传奇到了中唐贞元、元和时代，才名篇叠出，而这个时代，又正是进士词科日益为士人所贵重、争以引人注目的行卷来求知己的时代，则传奇的发达，与进士们用它来行卷有关可知。”<sup>56)</sup>可见传奇的繁盛与行卷干谒风气的对应和关联。对于六朝小说、唐代传奇与干谒的密切关系，鲁迅先生曾提及说：

至于他们之所以著作，那是无论六朝或唐人，都是有所为的。……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形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许预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作“行卷”。诗文既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于是那时的传奇文，也就和“敲门砖”很有关系。但自然，只被风气所推，无所为而作者，却也并非没有的。<sup>57)</sup>

54)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卷八，111页。

55)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八卷，6页。

56) 同上，78页。

可见“小说”作为干谒的手段或功能，自先秦以降，经魏晋六朝，到唐代，发展至巅峰之极的地步。

陶渊明《乞食》诗，作为反映干谒的作品，亦有论者视为“虚构”“小说”，诗人藉以自嘲为戏，虚言其事。典型论者如域外学者一海知义，他认为“《乞食》、《止酒》，都与‘虚构’有关”，并且指出：“《乞食》诗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首假托的诗，象征性的诗。《止酒》诗的手法与小说的构思‘虚构’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从构筑的作品世界、嗜好‘虚构’的观点来看，还是有关联的。”<sup>58)</sup>他将《乞食》、《止酒》两诗同时加以讨论，强调它们“小说的构思‘虚构’”等手法。通过《乞食》诗，陶渊明以虚拟之能力，同魏、晋其余干谒品评之志人小说一起，上承庄子时代以小说干谒县令之古风，下启唐人传奇小说干谒之先鞭。

## 6. 结语

总而言之，在晋、宋私家著史肆力炒作的时代风气里，陶渊明笔下的这些叙事性传记作品，《五柳先生传》、《孟府君传》及咏史诸篇等，透过后世或现代人的视角，它们和“小说”之间不免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五柳先生传》兼具“古小说”实象和短小的两大特征；《孟府君传》注重写传主的脱俗的逸闻趣事，其主体内容与稍后盛传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颇为相近；《咏三良》、《咏荆轲》等虽为咏史，却是对出于民间街谈巷语古小说题材的翻新。

同时，我们通过回顾先秦小说“饰小说以干县令”的干谒功能，以及横向比较魏晋志人小说兴盛与干谒风气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一海知义所提及的《乞食》一诗的“小说的构思”，正折射出先秦以降“小说”干谒在陶渊明作品中的体现。《乞食》作为一首干谒作品，虽然是以诗的形式，但其谋篇构思、文学功用，展现的都是“小说”面目。陶渊明吸收先秦“小说”干谒的虚构模式，创作了这首《乞食》诗。由此可

57) 鲁迅《题未定草》(六)《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72页。

58) [日]一海知义著，彭佳红译《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中华书局，2008，59页。

见，恰如其分地认识陶渊明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将会自然呈现出一些崭新的视角，启发我们许多新的思考，给传统的陶渊明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 參考文獻

-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 (汉)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
- 黄仲仑,『陶渊明作品研究』, 帕米尔书店, 1965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鲁迅《题未定草》(六)《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唐)刘知几撰, (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逯钦立,『陶渊明集』, 中华书局, 1979
- 李文初《陶渊明论略》,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 1981
- (汉)应劭著, 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 中华书局, 1981
- 钱钟书,『管锥编』, 中华书局, 1986
- (汉)王充著, 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 1990
- (南朝宋)刘义庆著, (南朝梁)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清)顾炎武著, (清)黄汝成集释, 秦克诚点校,《日知录》, 岳麓书社, 1994
- 石昌渝,『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魏正申,『陶渊明探稿』, 天津出版社, 1996
- (宋)苏轼著, 屠友祥校注,『东坡题跋』,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中华书局, 1997
- 丁永忠,《陶诗佛音辨》,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说》,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1
- (清)赵翼著, 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 中华书局, 2003
-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 李剑锋, 《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 齐鲁书社, 2005
- 顾随讲, 叶嘉莹笔记, 顾之京整理《顾随诗词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杨勇, 『陶渊明集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杨柳桥, 《庄子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龚斌《陶渊明与佛教关系之再讨论》《第三届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江学院学报》, 2008
- [日]一海知义著, 彭佳红译『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 中华书局, 2008

## Abstract

###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orks of Taoyuanming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Writing

Park, Woon-seok · Zhong, Shulin

Tao Yuanming had the excellent ability of history writing, and the ability was approved and accepted by the authority. As the custom of that time in the Jin and Song Dynasty of ancient China, those historical writings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ovel in the eyes of modern times. Such as Biography of Scholar Wuliu and Biography of Mengfujun, and the works of yongshi, and so on. Although the particular work like the poetry Qishi was presented by the poem, its conceive and its structure, and its function, were all shown by the features of novel. Tao Yuanming absorption the fiction pattern from the pre-Qin novel seeking scholarly honor and official rank, and with the idea novel produced the poetry Qishi. Such cogni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 Yuanming and the novel works, would benefit to some explorations, and promote the deeply research of Tao Yuanming.

**Key words :** 陶淵明(Tao Yuanming), 小說敘事(Fictional Narrative Writing), 五柳先生傳(The Biography of Scholar Wuliu), 孟府君傳(The Biography of Mengfujun), 世說新語(Shishuoxinyu), 乞食(Qishi)

투 고 일 : 2015. 5. 10. / 심 사 일 : 2015. 5. 15.~ 2015. 6. 15. / 게재 확정일 : 2015. 6. 16.